

郭健 著

取经之道与务本之道

《西游记》内丹学发微

《西游记》称“取经之道不离了一身务本之道”，明清学者普遍认为《西游记》是一部借叙述取经故事来阐扬“金丹大道”的“证道书”。这“一身务本之道”和“金丹大道”其实就是道教内丹学。要深入研究《西游记》，必须首先了解道教内丹学。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取经之道与务本之道:《西游记》内丹学发微 / 郭健著.
—成都:巴蜀书社,2008
ISBN 978-7-80752-123-5

I. 取… II. 郭… III. ①西游记—文学研究—文集
②道教—文集 IV. I207.419—53 B95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4360 号

取经之道与务本之道:《西游记》内丹学发微 郭 健 著

责任编辑	谢正强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科刊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5.75
字 数	160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123-5
定 价	14.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自序

我认为《西游记》是一部借叙述唐僧师徒取经故事来阐述道教内丹学的特殊“证道书”——这一观点其实早在明代《西游记》问世之初便有人提出，清代一些了解内丹学的人还专门从内丹学的角度对《西游记》作了详细的点评，如汪象旭的《西游证道书》、陈士斌的《西游真诠》、刘一明的《西游原旨》等等。但由于这些人对内丹学本身就未能阐释清楚，他们的观点缺乏严格的论证，其点评仍然使用大量的隐语，所以大部分读者看其作品如同看另一部丹经一样，根本不知其所云。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这一观点更被全盘否定，国内学术界对《西游记》的研究大多只限于文艺理论和历史考证，以致《西游记》中许多关键性的重大疑点不能够得到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后，海内外有少数学者重提汪象旭等人的基本观点并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但这些学者同样也未能专门把内丹学阐述清楚，所以这个观点也仍然一直未能让大多数读者理解和接受。

《西游记》的目录和诗词中蕴含着大量的道教内丹学术语，且有许多关于内丹学的明确提示，如所谓“经乃修行之总径，佛

配自己之元神”，“兄和弟会成三契，妖与魔色应五行”，“取经之道不离了一身务本之道”等等。《西游记》与内丹学明显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只要是对内丹学有所了解的人其实均不难看出，但要把《西游记》同内丹学之间的具体关系理清楚，则首先必须对内丹学有着较广泛深入的了解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内丹学本身阐述清楚，可惜目前尚未能有研究者做到这一点。

道教内丹学又被一些道教徒称为“金丹大道”，它是道教文化的核心，可以说，不了解内丹学就无法真正理解道教文化，尤其是唐宋以后的道教文化。但是由于道教内丹学流派众多，阐述内丹学的丹经卷帙浩瀚、文字晦涩、隐语复杂且带有相当的神秘色彩，所以很长时间内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少之又少，一度几乎成为禁区。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才有所改变，不过，迄今为止，道教内丹学的研究比起道教文化其他方面的研究仍然是远远不够的，以内丹学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至今仍然十分稀缺，这种情况与内丹学在道教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极不相称。

我从1990年开始接触内丹学，随后即开始关注内丹学与《西游记》的关系。2001年开始发表相关的学术论文，至今共发表研究内丹学和《西游记》的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在这期间，我深感内丹学研究的艰辛和相关学术成果发表的困难，从一定程度上理解了国内道教内丹学研究成果稀少的原因，同时也得出这样的认识：如果没有对道教内丹学的充分研究为前提，那么，对《西游记》的研究永远只能是隔靴搔痒！这次我把平时撰写的一些论文整合出版成书，书中内容有的是对内丹学进行专门的研究，有的是剖析《西游记》与内丹学的关系，有的则是在研究过程中得出的一些关于宗教和文学艺术关系的思考。如果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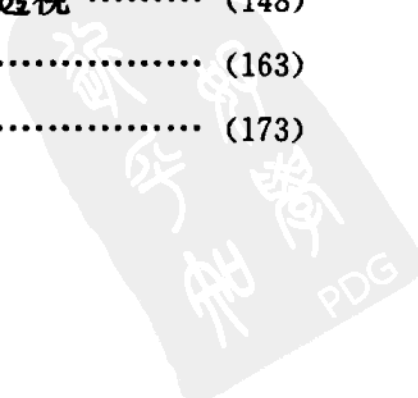
书的出版能引起一些普通读者对内丹学的关注，我将非常欣慰，同时，我也希望书中内容能为专门的宗教研究者和《西游记》研究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书中内容可能会有一些不妥甚至错误之处，欢迎读者指正。



目 录

新中国《西游记》主题研究述评	(1)
唐末五代钟吕内丹研究	(8)
《西游记》与金丹大道	(44)
道教史上的内丹学五宗派	(54)
道教南北宗内丹学之比较	(64)
《西游记》中“真经”的内丹学寓意	(73)
道教内丹学的佛教观	(81)
《西游记》对佛道典籍的袭用现象略析	(93)
道家语言观与道教内丹学	(103)
五代内丹家谭峭及其《化书》	(110)
《西游记》作者与道教内丹学	(123)
阿赖耶识、元神与集体无意识	(136)
佛配自己之元神——《西游记》中的佛教现象透视	(148)
宗教与艺术关系论	(163)
道教内丹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173)



新中国《西游记》主题研究述评

《西游记》的主题究竟是什么？这是个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从新中国成立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学者们普遍把《西游记》看作是一部借神魔故事来影射现实生活的政治小说，其中相当一部分学者对《西游记》中的神魔进行了阶级划分，把故事中的角色形象与现实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人物对号入座。例如，当时影响极大并作为普通高校教材的《中国文学史》就认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代表反封建的劳动人民，孙悟空大闹天宫、降妖伏怪等情节“体现着苦难深重的人民企图摆脱封建压迫，要求征服自然，掌握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而历史上风起云涌、此伏彼起的农民战争，则构成这一幻想情节的现实基础……《西游记》里的多数妖魔都和神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孙悟空的抗魔斗争……意味深长地寄寓了广大人民反抗恶势力，要求战胜自然、克服困难的乐观精神，相当曲折地反映了封

建时代的社会现实”^①。当时的大多数学者都持这一观点。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的意见与这一观点不完全相同，有的认为《西游记》的主题应是起义者接受封建统治者招安：“孙悟空从魔到神的转变，实质就是从叛逆英雄蜕变为统治阶级的帮凶和打手。”还有的学者认为孙悟空是“一个当时封建当权派的反对派，一个地主阶级的激进派，或者说它基本上是像吴承恩这样一类中小地主的化身”。有的则认为孙悟空是“新兴市民化身”，是“资本主义萌芽要求冲破封建势力重重限制束缚的愿望在神话中的表现”^②。这些观点虽然不尽一致，有的甚至相互对立，但都认为《西游记》的主题是表现阶级斗争等政治问题，都可归为“政治说”。不可否认，人类自从进入阶级社会后许多事情确实都与阶级、政治密不可分。然而，研究者要想确认《西游记》是一部反映阶级斗争等政治问题的小说，却又无法在《西游记》原文中找到直接有力的证据。众所周知，这类观点其实与当时单一的文艺理论导向有密切关系，其研究方法有先入为主的“政治图解”之嫌。

20世纪80年代初，虽然一些学者仍然坚持用现成的文艺理论套《西游记》，完全从政治角度来考察《西游记》的主题，但也有一些学者看出了这种研究的局限性，开始提出反对意见，如何满子在《西游记研究的不协和音》中便指出：“不能说吴承恩对他所处时代的封建秩序没有不满情绪，对现实没有愤激之处，但他并未蓄意用小说宣扬被压迫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吴承恩根

^① 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中国文学史》第4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08—110页。

^② 这些观点详见《〈西游记〉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本无意将孙悟空当作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孙悟空的改邪归正因此也不意味着阶级战士的屈服投降。也许孙悟空的被降伏象征着邪不胜正的抽象哲理。”^①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初，国内学术研究气氛日益活跃，许多学者逐渐摆脱了“政治图解”式的研究方法局限，于是出现了不少新的《西游记》主题观，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游戏说”，代表人物为江苏学者吴圣昔，他在《西游新解》中就论证了《西游记》“是一部游戏之作”，是作者“游戏笔墨的艺术结晶”。这种观点其实是重提胡适、鲁迅的观点，如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曾断言：“《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它至多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而不用深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曾说过：“然作者虽儒生，此书则实出于游戏，亦非语道，故全书仅偶见五行生克之常谈，尤未学佛，故末回至有荒唐无稽之经目。”另一类是“哲理说”，即认为《西游记》主题是表现某种哲理，这类观点其实在 80 年代以前也已有人提出过，只是他们的声音微弱，常被淹没在当时流行的“政治说”之中。80 年代中期持这类观点的人逐渐增多，如方胜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谈谈西游记主题的基本性质》中说：“作品全部故事情节及其人物间的冲突，其实是在总体上显示着人生道路上所必然要碰到的某种或某些方面的富有哲理意味的启示。”它“涵括了人生道路上所可能遭遇和经历的一切有关问题在内”。后来的许多学者都持这一类观点，只不过他们认为《西游记》所表现

① 何满子《西游记研究的不协和音》，载《江海学刊》1983 年第 1 期。

的具体哲理则各不相同，如诸葛志认为《西游记》主题是“将功赎罪”，表现了人们的一种“被动入世”的精神；田同旭认为“《西游记》是一部情理小说”，其主题就是表现“情理之争”；王志尧、全海天认为《西游记》“归根结底是奉告那些曾经犯过各种错误的人到社会实践中去学习并掌握生存的本领”……

“游戏说”和“哲理说”都没有套用原来的文艺理论，其中“游戏说”的主要理由是：《西游记》表面上是写宗教故事，并通过书中人物宣称“三教归一”，但许多关键之处却又与宗教理论不符，且有不少情节还明显对佛道进行了嘲弄，全书总的说来前后矛盾、破绽百出，没有什么明确的主题，而是笼罩着一片幽默诙谐的游戏气氛，因此它应该就是一部游戏之作。“哲理说”同样认为《西游记》的主题不是表现宗教教义，但却坚信这么一部文笔优美、情节连贯、故事完整的长篇巨著不可能纯粹是一部游戏之作，而肯定是表现了某种哲理。但《西游记》具体要表现什么样的哲理呢？研究者的观点似乎都有些道理，不过要令人确信某位研究者的观点就是《西游记》的原旨，却又都缺乏铁证。

20世纪90年代中期，山西出现了一位较有影响的《西游记》研究者李安纲。他从90年代中期至今发表了不少论文和论著，并分别在山西和北京主持召开了四届《西游记》学术研讨会。李安纲认为《西游记》的目录和诗词都蕴含着大量的“金丹大道”术语，这些术语正是对书中实质内容的提示，而原来的《西游记》研究者却几乎都对此视而不见或不去深究。他通过研究这些术语而得出的结论与明清时的许多研究者观点相同：“《西

游记》的主题就是道教全真道的金丹大道。”^① 李安纲的观点在学术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高度评价者有之，坚决反对者也不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观点确实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此后的《西游记》研究呈现出一个显著的新特点：研究者越来越重视《西游记》的文本（包括目录和诗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肯定《西游记》的主题同宗教教义的关系。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至今，除一部分研究者仍坚持“政治说”、“游戏说”、“哲理说”外，更多的研究者则认为《西游记》主题是表现佛道儒“三教”思想，其中有的研究者与李安纲观点相近，认为《西游记》主题就是道教思想（包括“金丹大道”），如王圣乙《四众五行合三藏》（载《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97 年第 4 期）、陈金宽《〈西游记〉宗教修行内景探微》（载《郑州大学学报》1998 年第 3 期）、刘直《漫谈〈西游记〉文笔的道教情趣》（载《中国道教》1998 年第 2 期）、孙国中《〈西游记〉作者及其创意初探》（载《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 年第 4 期）等等。也有的研究者认为《西游记》的主题是佛教（主要是禅宗）思想，如克珠群佩与王意如《论〈西游记〉的崇佛倾向》（载《宗教学研究》1995 年第 1 期）、康金声《〈西游记〉的文化信息与主题思想》（载《山西大学学报》1995 年第 1 期）、李洪武《〈西游记〉与禅宗》（载《佛教文化》1999 年第 2 期）、贾三强《禅门心法——也谈〈西游记〉的主题》（载《咸阳师专学报》1999 年第 4 期）、王齐洲《〈西游记〉与心经》（载《学术月刊》

^① 李安纲《〈西游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载体》，载《湖北大学学报》1999 年第 3 期。“金丹大道”即道教内丹学，包括道教内丹术及其相关理论。

2001年第8期)等等。还有不少研究者则认为《西游记》的主题应该是儒家理学(心学),如花三科《佛表道里儒骨髓》(载《宁夏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宋克夫《吴承恩与明代心学思潮及〈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载《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朱恒夫《〈西游记〉:艺术化了的心学》(载《东南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单继刚《〈西游记〉中儒释道观》(载《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第1期)、毛晓阳《修心与修命》(载《福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3期)、刘辰莹《〈西游记〉中三教地位辨析》(载《华侨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等等。这些观点有个共同点,都把三教思想中的“心性”说看作是《西游记》的主题,但具体是道教、是佛教还是儒家的“心性”说呢?却还一直没有定论。

回顾新中国以来学术界对《西游记》主题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学者们的研究方法总体上经历了一条从“套用理论”、“千篇一律”到“大胆假设”、“不拘一格”,再到“以文为本”、“小心求证”的历程。《西游记》的主题至今仍在被人们探讨。笔者认为:对于《西游记》这样一部宏篇巨著的主题,各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难免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毋庸讳言,正如绝大多数学者所公认的那样,《西游记》的主题客观上只有一个!而学术界至今仍然这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一方面固然是学术争论自由的表现,但另一方面却也说明《西游记》研究还有不少关键问题需要解决:例如一些肯定或否定《西游记》主题是“三教”教义的研究者,他们自己对“三教”的了解其实都还较片面和肤浅,并没有能力对《西游记》中的“三教”现象进行全面的分析和归纳;李安纲先生称《西游记》主题为“金丹大道”并写了

《苦海与极乐》、《西游记新评新校》等论著进行剖析，然而遗憾的是这些论著也只是在谈论《西游记》同“金丹大道”的联系，而对“金丹大道”本身却并没有阐述清楚，这样当然无法让其观点获得读者们的理解，更不可能获得公认了。通过回顾过去，笔者认为：今后《西游记》主题研究还应继续解放思想，坚持客观求实的治学态度，以《西游记》的文本为本，对《西游记》的故事内容及其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包括儒佛道“三教”思想）进行全面深入的发掘并融会贯通，这样《西游记》的主题才可能会有一个不受其他因素影响的纯学术研究的定论。



唐末五代钟吕内丹研究

一、钟吕内丹术理论概说

内丹术理论是唐宋以后道教成仙思想的主流。按后世道教徒的说法，内丹术起源很早，其发端甚至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黄帝之师广成子等人，不过，这些说法很难查证。从文献中看，《老子》、《庄子》、《周易》、《黄帝内经》等著作都对内丹术理论有重要影响，《太平经》、《抱朴子》、《黄庭经》等著作中也有不少类似于内丹术体验的描述，如《太平经》中的守一法：“夫欲守一，乃与神通，安卧无为，反求腹中。”“守一明法，四方皆暗，腹中洞照。”“守一之法，老而更少，发白更黑，齿落更生。”“守一明之法，未精之时，瞑目冥冥，目中无有光。守一复久，自生光明，昭然见四方，随明而远行，尽见身形容。”^① 这些描述与后世内丹书中关于内丹术方法和效验的记载基本相同。再如《太平

^① 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39—741页。

经》中的这段描述：

瞑目还自视，正白彬彬。若且向旦时，身为安著席。若居温蒸中，于此时筋骨不欲见动，口不欲言语。每屈伸者益快意，心中忻忻，有混润之意，鼻中通风，口中生甘，是其候也。^①

类似的体验描述在后世内丹书中非常普遍，现代内丹术研究者胡孚琛先生认为，这段话描述的似是内丹术“活子时”的景象^②，笔者以为然。

不过，直到隋朝以前，专门的内丹术著作尚未出现。隋朝以前的道教经典中虽有一些关于内丹术方法和体验的描述，但这些描述内容较少且是同其他道教方术的描述混在一起的，在全书中地位并不占优，如《太平经》中除了介绍“守一”法之外，更多的内容则是介绍存思、房中、符咒等方术，《抱朴子》是以修炼外丹为成仙之要，《黄庭经》中主要倡导的存想“五脏六腑之神”的修炼方法与内丹术仍有本质区别……

到了隋朝，道士苏元朗（号青霞子）才开始正式提出内丹之说。“内丹”一词最早出现于梁朝僧人慧思的《立愿誓文》：“借外丹力修内丹，欲安众生先自安。”但直到隋朝苏元朗的《旨道篇》问世，“自此道教徒始知内丹矣”。陈国符先生在《道藏源流

① 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页。

② 胡孚琛、吕锡琛《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仙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24页。

考》附录六中也认为：“盖自此始有内丹之称。而葛洪之金丹，乃称外丹。内丹书籍，行文隐秘，疑亦始自青霞子。”与此几乎同时，《周易参同契》开始在社会上公开传布，苏元朗称此书是内丹专著。《周易参同契》本创作于汉代，但当时尚未形成影响，直到隋朝苏元朗指出它是内丹著作之后，才开始广为流传。而实际上它究竟是外丹著作还是内丹著作，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便一直存在很大争议，在此我们不敢妄议，但可以肯定的是，《周易参同契》这种融“大易”、“炉火”、“黄老”为一体，大量采用隐语的阐述方式为后世的内丹术著作确立了一个基本模式，书中的一些基本原理（如“阴阳相交结成还丹”）及一些炼丹术语也为后世内丹书所继承，后世的内丹家均尊它为祖书，这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我们可以说，隋朝《周易参同契》在社会上流传是内丹术理论初步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隋唐时期，苏元朗之后又涌现了一批知名内丹家，如刘知古、罗公远、叶法善、张果等，他们又作了不少内丹术专著，如《日月玄枢篇》、《真龙虎九仙经》、《真元妙道修丹历验钞》、《还丹金液歌》等等，不过这些作品中的内丹术理论还非常粗浅，在社会上影响也很小。

唐末五代，终于出现了道教史上划时代的两位内丹大家：钟离权与吕洞宾，后世常合称“钟吕”。

关于钟吕的生平，在正史中虽无明确记载，但在《金莲正宗记》、《金莲正宗仙源像传》、《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等道教经典、神仙传记、金石碑刻及宋代小说笔记中却有大量的记载^①。从这

^① 详见张广保《唐宋内丹道教》第三章、第四章，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1 年版。

些资料文献中我们基本可以确定，钟离权和吕洞宾都实有其人，钟是吕的师父，他们都生活在唐末五代时期，以内丹术传道，在民间社会曾有较大影响。

吕洞宾的亲传弟子中最著名的是施肩吾，他不但自身参与了内丹术修证，还曾著书立说，并对钟吕著作作了编定，对钟吕内丹术的流传及影响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流传下来的托名钟吕所著的内丹书非常繁杂，其中较著名且较为可信的有《钟吕传道集》、《灵宝毕法》、《破迷正道歌》、《太乙金华宗旨》、《灵宝篇》、《百问篇》、《九真玉书篇》、《修真指玄篇》、《会真篇》等等，这些著作同施肩吾所著的《养生辨疑诀》、《西山群仙会真记》、《华阳真人秘诀》等作品被共同认为是钟吕内丹术理论的代表。

钟吕内丹术理论在前代内丹书的基础上，解释了何为“大道”、何为“成仙”等重要问题，并对“得道成仙”的方法、步骤及可能出现的现象、证验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随后使得内丹术理论盖过了道教的其他学说，一跃成为道教修仙理论的主流。不仅如此，钟吕对后世道教界及民间社会也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后世的各派内丹家几乎都把钟吕尊为祖师；在民间，吕洞宾也一直是最著名和最受崇拜的“神仙”。

不过，从纯理论角度看，钟吕内丹术理论虽影响巨大，但还不能算是成熟的理论，因为它有着非常明显的缺陷：概念较含混不清，论述不严密且过于琐碎繁杂。以至元人苗善时著的《纯阳帝君神化妙通纪》一书在尊崇吕洞宾的同时曾公开抨击托名钟吕所著的内丹书：“世传《灵宝毕法》、《钟吕传道集》，谬妄之甚！乃要名尚奇之士为之。或云施肩吾作，亦未知是否？……《传道